

论德国移民问题与社会一体化

宋全成

(山东大学 欧洲研究所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从德国近代移民发展的历史来看, 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现象, 并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根本变迁。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 1990 年德国统一, 共有约 1500 万外国人来到德国, 德国越来越成为事实上的非典型的移民国家。但是在德国的移民并没有融入德国社会而成为德国边缘性的少数民族群体, 移民存在着广泛的不信任和防御心态, 德国人针对外国人的暴力排外行为也有增无减。其原因就在于德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大众两个层面, 不愿意承认德国作为一个非典型意义、事实上的移民国家的存在, 因此, 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上只有外国人法, 而没有移民法。要彻底地解决德国的移民问题, 完成移民的社会一体化的任务, 就必须制定和实施系统、完整、有效、积极的新移民政策。

关键词: 德国移民; 移民国家; 移民政策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 A

迁移和移民, 在欧洲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从欧洲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 欧洲范围内的和超欧洲范围内的移民和迁移现象, 始终存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启的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更加强了跨越国境线的移民的数量和规模。一向以德意志民族为自豪和骄傲的德国, 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 其民族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彩, 特别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 在其统一的国界内, 生活着一个多结构的、多民族的日益增长的移民人群, 他们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工作移民 (Arbeitswanderer), 有本土的以前的客籍工人 (Gastarbeiter) 和来自东欧和世界各地的寻求政治避难者 (Asylbetragter) 和其他的难民 (Fruechlinge)。在原西德居住的外国人, 从 1960 年到 1990 年德国统一, 由 686100 人上升到 5241801 人, 到 1992 年 12 月达到 650 万人, 到 1993 年 12 月达到 680 万人。其中大约有 400 万人, 占 62%, 来自于从前的招募劳动力的国家。外国人的比例在西德从 1960 年的 1.2%, 上升到 1990 年的 8.2%。此后在德国始终存在一个强大的移民群体。1990 年德国的统一, 并没有阻止统一的德国向着一个移民国家前进的步伐。1990 年德国的 82 万迁入移民中, 只有 46.6 万人迁出(+35.4 万人), 1991 年 92 万人中有 49.72 万人迁出(+42.3 万), 1992 年有移民 98.69 万人, 有 71.03 万迁出 (+27.6 万), 这还不包括没有在移民局登记的较高的“黑人”人数。^{[1] (P230-231)} 德国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上, 正成为欧洲移民现象的中心旋转舞台。德国在事实上越来越成为一个移民国家。^[2]

然而, 在德国却存在着一个矛盾的社会现实: 一方面德国越来越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 尽管以往的德国政府和德国社会大众层面, 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 大量的移民群体和外国人的存在、以及事实上的移民国家, 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移民政策和社会政策。由此造成了以排外为特征的右翼政党的崛起和新种族主义、新纳粹主义的出现。本文拟就德国的移民问题, 从历史发生学的研究视角出发, 运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 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20 世纪前的德国移民历史

1. 德国始终存在着移民。

在今天的许多德国人看来，大量的外国人存在于德国的社会现象和事实，以及德国人和外国人的这种移民运动，既是新鲜的，也是危险的。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跨越国界的人群的运动和他们的不同民族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碰撞，并不是例外，而是人类社会最发展的法则。德国今天许多定居的人群，实际上也是外国移民的后裔，上百万迁出的德国人在国外同样是外国人，就好像今天的外国人在统一的德国一样。

德国著名的移民研究的学者、Osnabrueck 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 (IMIS) 的 Klaus J. Bade 教授、博士，在其著作《跨文化的挑战：——跨越国境的人们和跨越人的国境》(Die Multi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 Menschen ueber Grenzen-Grenzen ueber Menschen) 中认为，在人们的日常记忆里，应当被唤起的是：那些被称为“小德国人”和大量移居海外的“德国区”的历史记忆。在跨越大西洋到“新世界”的 19 世纪，他们一代人走出国门就好像今天的“小 Istanbul”或者是其他的移民后裔在多结构的德国大城市中的移民区、就好像今天的柏林市中有一个土耳其外的“土耳其城”一样。在 19 世纪的“新世界”里，也有许多大城市被强烈地打上了德国人的“德国——美洲人”的社会印记，这还不包括中西部的德国人。

Bade 教授认为，知识发展与历史变迁的事实表明：人类知识和技能的增长与发展，是与迁移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欧洲历史上看，在专业的工具书里，曾经是这样来看待内行的：他的能力，他的熟练技巧和实践经验知识，是通过漫游和迁移而增加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的历史上，曾经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为了著书立说而漫游欧洲各国的原因。如果这样观察，那么，德国人自己也涉及到迁移或漫游的问题。因为在历史上许多德国人在国外和许多外国人在德国，都是独特的社会部分，事实上经历了跨越国境线的移民事实的多种形式：迁出、迁入和过境的移民、从德国到国外的和从外国到德国的工作移民等等。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德国的这段历史，我们还会发现：不仅存在着人的跨越国境的迁移，而且也存在着跨越人的国境的移动。在德国的历史上，德国本土内也有跨越广大地区的强大的内部迁移，从东西远距离的 Ruhrpolien 到 Ruhrmasueren 的迁移，从普鲁士东部到 Montan 工业化的 Ruhr 和 Emscher 地区，到帝国时期一直到原先德国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的迁移，这也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1] (P232)}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是，在德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始终存在着多数与少数、本土人与外国人的冲突，这种冲突通过历史的追忆而复杂化，这也适应于从跨越国境的人的迁移到跨越人的国境的运动的相反的社会现象。在德国的历史中，从其国境内排斥少数民族，如犹太人，Sinti 人和 Roma 人及其他少数人群，总的来说并不是连续的或线性发展的。但可以清楚辨认的是：在 19 世纪早期的与外来人划清“美化的种族——Roma”界限的道路。“人种的——国家的 (种族)”在 19 世纪晚期是针对外来人的。20 世纪早期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针对外国人的种族灭绝和由德国占领的欧洲对移民的残酷迫害，已经臭名昭著。直到盟军和苏联军队占领德国领土，德国才走出了对种族的、文化的、地区的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恐怖犯罪的阴影。

德国不能回避关于移民迁移的适应问题和针对外来少数民族的实际的极右政策的现实问题。因为历史上的迁出国，作为现实社会的迁入国，德国违背意愿带来了外国人在德国不断膨胀、社会就业困难、社会治安恶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由于德国缺乏稳定、统一和系统的移民政策和社会政策，德国作为移民国家，在多个方面，与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引起的移民问题，很少被重视和解决。

2. 德国的根本变迁：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

必须承认的是，德国自身经历了从移民迁出国到移民迁入国的变迁。迁出移民在德国有一个很长的历史传统，直到今天实际上也依然存在。12世纪中叶时，德国开始了往东的居民迁移。“**Siebenbureger Sachsen**”主要是从莱茵河和摩尔河到当时的乌克兰王国。到18世纪，德语区随之而来的其他迁移大军，在乌克兰被称为“**Banater** 和 **Sathmarer Schwaben**”人。他们通过外出迁移，开拓和保证了德国的国土，他们因此而得到了诱人的经济和文化上的特权。

在南欧、中欧和东欧，德国人在其居住区内长时间的享有经济上、法律上和文化上的特权。研究俄罗斯德国移民问题的德国著名学者 **Dietz Barbara** 和 **Hilks Peter** 在其著作《一体化或是孤立：在联邦德国的俄罗斯的回迁德国移民》（**Integriert oder Isoliert? Zur Situation russlanddeutscher Aussiedl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中认为，俄罗斯的许多小国，例如在 **Wohlynie**、在黑海、在高加索、甚至在伏尔加，自1924年就有一个规模较大的自治的“伏尔加德国共和国”（**Die Aotunome Sowjetrepublik der Wolgadeutsch**）。1941年斯大林击毁了这个共和国，以作为对希特勒突然袭击苏联的回答。它的居住者被流放到苏联的亚洲地区，他们中的许多人和他们的后裔在德国实现统一以后，作为 **Aussiedler**（外迁移民）回到了其祖先的家乡——今天的联邦德国。^{[3](P135)}

19世纪30年代以前，欧洲大陆的外迁移民主要走向东欧和南欧，首先到俄罗斯和哈波斯堡国家（**in die Habsburger Laender**），他们的踪迹在世界大战时多次通过强迫迁移、文化压制和最后通过后裔的外迁移民而消失。在德国也就是被称为外迁的人，而自己应理解为隔代的回迁的人。

19世纪30年代以后，德国大陆移民东迁的潮流让位于跨越大西洋的移民的西迁潮流，其中90%的外迁移民到了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中，出自对自由的渴望，首先是期望得到更好的经济方面的利益和新世界的进步梦想，大量的西欧人飘洋过海，去了美洲。

外迁移民尽管在德国被作为经济上的损失和文化上的“放血”而被指责（**Beklagen**），但它同时作为在资产阶级时代对付令人担心的社会革命的不可缺少的安全阀门——外迁移民同时也是社会革命问题的出口。在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看来，大量的移民外迁，也是社会革命和社会问题的输出。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有550万跨越大西洋的德国移民到达了美国，至今美国已接受了总计880万的德国移民。^{[1](P234)}

在威廉时期的德国，世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19世纪90年代迎来了跨越大西洋的外迁移民的结束。欧洲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紧张状况，首先是跨越大洋的外迁移民——是最重要的推动力，直接回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强大的经济增长中，曾经是劳动力过剩的工作岗位出现了劳动力的紧缺，在19世纪第三次和第四次大的移民潮中，1880——1893年，有180万德国人外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依据当局的估计，约有120万外来的迁移工人（**wanderarbeiter**）进入德国。

对通过移居海外的迁移的经济和文化损失的多方面的抱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交替的时候，出现了对大陆迁入移民（**Einwanderung**）幽灵的恐惧。担忧的不是来自欧洲的南部，而是跨越普鲁士德国的东部边界的大量移民。这个移民的幽灵被普鲁士严厉的社会政策所控制。依据普鲁士的防御政策，波兰的工作移民大多数被限制在普鲁士的东部。但在普鲁士那里，所有的外国工作移民都包括在这个控制系统内。但在现实中，来自德国东部相邻国家的劳动力服务，在春天的季节劳动中依然受到欢迎。在遭驱逐的惩罚面前，只要在

圣诞节以前离开普鲁士，则雇主按照有关政策因此就没有任何麻烦。雇主为发展其经济，需要雇佣大部分的外国劳动力，因而雇主在工业和纺织行业不断与当局进行斗争，但为了实现跨越年度的波兰劳动力被批准和同意求职的例外许可，大多是徒劳的。与此相反，普鲁士政府对来自南欧意大利的工人，却给予了十分宽容的政策。在普鲁士的 Ruhr 区，意大利的外来工人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自由来往，在 *Zuwanderung*（迁入）和 *Abwanderung*（迁出）之间更替。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面对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当局不再实行普鲁士的防御移民政策中的安全政策原则，而实行外国人的工作许可制度，以作为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理性：当雇主指出，相应的工作，德国的求职者不能被使用时，则雇佣外国人被许可。这种许可的义务被称为新的体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国家的劳动力管理部门作为先决条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保持很低的数量。到 1938 年国家社会主义时，由于经济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而有所增加，但对其实行了限制性的外汇政策，使外国工人工资的外流变得困难。^{[4] (P154)}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外国的求职者涌入了数百万，作为遭驱赶的外国人和战争战俘的奴隶大军——纳粹战争经济的外国劳动力补充。战争结束时，这些人成了被迫迁入德国占领区的移民（1000—1200 万）的主力。十几年以后，即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西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招募客籍工人，从而开始了外国人在德国工作的新篇章，而这一新时期只在很少的方面与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传统相联系。

二、战后德国的新移民及一体化进程

1. 战后德国的新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西德的人民、经济和社会，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工业化国家像德国那样，在 20 世纪下半叶，打上了跨越国境的迁移和移民的深刻烙印。在 1945 年战争结束到 1990 年两德统一这段时间里，共有约 1500 万外国人来到了战后两德——有难民、战争结束时被驱逐者、战后来自东德的难民、外迁移民以及来自东欧和南欧的回迁者。另外，在德国统一前夜的西德，有大约 520 万的外来少数民族人群。

在被分裂和最终统一的德国，可以区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三次大的移民社会适应的进程。一是在东德和西德的战争难民和遭驱逐者的一体化进程；二是从 50 年代中期开始的，在西德从外国人的招募到客籍工人的移民适应问题；三是，最终在 1990 年统一后的德国的移民适应情况（*Einwanderungssituation*）。

第一次大的社会适应进程是来自德国东部和来自东欧地区的难民和被驱逐者的一体化。在西德被通称为“家乡驱逐者”（*Heimatvertriebene*），在东德则被披上了美丽的彩色，被称为“迁居者”（*Umsiedler*）。在西德的几十年里，颇有影响力的被驱赶者的组织是作为“家乡的权力”（*Recht auf Heimat*）被要求和公开的，而在东德，出于对其东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考虑而将艰巨的移民问题（*Umsiedlerproblematik*）列为禁忌。

在东德，一直到柏林墙的建立，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移民（*Zuwanderung*）和适应的问题（*Einwanderung*），而是外迁移民（*Abwanderung*）和通过逃跑和东德政治体系的维持并最终不断增加的合法的“外迁”到西德，从而将其分离出去的问题。他们在西德因为来自于共产主义的强权地区而带有忏悔的特征，并因此在政治上而被西德所接受，并作为流入的劳动力受到欢迎。而在东德，“逃跑：作为一种惩罚行为，从 1950 年开始以来，在可能的

公开讨论中，尽可能的死一般的沉默，许多移民、适应、不适应和外迁相联系的问题，在东德被列为禁忌和在公开场合中被压制。”

在西德，由于存在着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东德对东德人移民到西德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当时的西德开始了二战以后的招募外国劳动力的历史。当西德与意大利于 1955 年签署协定由当局组织招募外国劳动力的时候，许多被驱逐者和难民在他们“新的家乡”里，依然是陌生的，由此开始了西德第二次社会适应的历史。东德柏林墙的建立加速了西德违背自己的意愿而走上移民国家的道路，西德对外国劳动力的招募，在 1961 年东德结束涌入西德的人群以后，得到了加强。但是，对于从外国招募来的人群的长时间的社会适应问题以及由此相联系的社会后果问题，在西德没有长久的和全面的计划草案。外国人政策在数十年里是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核心，被使用于外国人。

在西德，“客籍工人的时代”是与 1973 年的“停止供应”相联系而结束的。由于客籍工人的流动性不利于工作技能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客籍工人尽管短期降低了外国人的数量，终止了外国移民的跨国流动，但是，反而加强了谋求长期居留的增长趋势。因为当时西德政府对客籍工人提出，那些不想与自己的出生国的家庭分开的外国劳动力，只能在二者选择其一：要么返回自己的家乡，要么全家迁到德国来。结果，大部分人留了下来，并随后全家搬来。家庭的迁移和人口的自然增长，使联邦德国 1979 年的外国人口，已经再次上升到 1973 年达到的高水平。

与居留期间同时增长的是从客籍工人到永久移民的连续的长期居留的愿望。从 1980 年开始，西德那些来自于过去客籍工人人群的外国少数人群中的大部分，生活在一种非移民国的长期矛盾的移民现状的适应进程中。这个问题被西德的政治界所否认，在管理机构中也被列为禁忌，在政治决策中被压抑和排斥。关于移民和社会融合的问题合乎逻辑的被终止。因为人们将其列为禁忌的东西是不可能被设计和安排的。^{[5] (P223)}

在东德，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外国人就业存在于国家约定的基础上。依据规则，在官方的场合，移民问题要么是死一般的寂静，要么作为进修学习的移民的作用被低估。1980 年，在东德的外国工作者（*Auslandischen Werktaetigen*）——像在西德的客籍工人（*Gastarbeiter*）——的大多数工作在德国劳动力不愿意从事的职业领域，多是在一些艰难工作环境下的直接生产面上。例如有 3/4 在倒班工作制上工作。

与西德政府签定有期限的劳动协定不同的是，“在东德，外国工作者被官僚主义的独裁统治管理着，与国家规定的界限相比，很少有社会一体化的行动。他们被安排在分离的集中营房中（*Gemeinschaftunterkuenften*），并因此与东德社会保持相当的距离。在这些通过政府与外国人划清界限的真空中，滋生着潜在的针对外国人的紧张和敌对（*Fremdenfeidlichen Spannung*），这种紧张和敌对在极权主义的强迫惩罚结束以后便公开明显地表现出来。”^{[6] (P125)}

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德国人，无论是东德人还是西德人，都沉浸在两德统一的喜悦中。出于政治——意识形态上、生活经历上等多方面的考虑，都对没有解决的移民问题和移民的社会一体化问题只字不提。

2. 统一进程中的“本土外国人”和“陌生德国人”

1990 年之前，统一进程中的移民新的社会适应情况（*Eingliederungssituation*）是一直被人们忽视的。在德国的移民大军中，“本土的外国人”、“陌生的德国人”等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移民群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社会适应进程的问题。

1. 德国本土的外国人。过去是、现在是、而今天依然是最大的有了三代的移民第一支大军，这支大军主要是来自以前的客籍工人人群（*Gastarbeiterbevölkerung*），就国别而言，主要是来自土耳其和意大利。这些德国本土的外国人，在德国被看作是少数民族，其中第一代移民已经到了领取退休金的年龄。

2. 陌生的德国人。是指拥有德国国籍、但对德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经济等缺乏了解的来自于东欧的移民群体，这是移民的第二支大军。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每年有数十万的迁移的（*zugewandert*）来自东欧的陌生的德国人，进入德国。这些来自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尽管被赋予了德国国籍，但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的生活在过去的共产主义的统治范围和非法制的（公正）（*rechtlich*）社会中，因此，在社会和文化意义上依然是陌生的——他们带着沉重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负担而回迁德国的（*Rueckwanderung*）。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处于一种真正的移民情况中（*Einwanderungssituation*）。

3. 难民和政治避难者。从 1980 年开始，不断加强的难民和政治避难者的数量，构成了德国新移民的另一支大军。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今天则大部分来自东欧国家。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起初的政治避难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欢迎。因而，这类移民的数量激增。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移民问题的凸现，德国不得不实行了新的有限限制性的政治避难法，从 1993 年开始，新的政治避难法明显降低了政治避难申请者的数量。但却明显刺激和提高了非法的国内居留者的数量。在德国，还有新出现的来自于前苏联的犹太迁移者，他们的数量在 1993 年被估计有 15000-20000 人。

与跨越统一的共和国外部边界的移民（*Zuwanderung*）相伴随的是，在德国国内还存在着两个需要加以解决的跨越国界的人们和超越人的国界运动的社会适应问题。

一是跨越国境的人们：在西德，从 20 世纪 80 年末期到 1990 年，来自于东部的，首先是（DDR）东德的难民，作为迁移者（*Übersiedler*）进入西德。他们大多数处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误以为由于都是德意志民族和民族文化而具有的一致性（*Identitätsproblem*），因此，一旦来到“金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便可以获得物质、生活方式、文化和社会心理上的巨大跃迁。但现实是，来自东德的难民和避难者在西德，他们的过高期望完全落空，并经历和遭受着西德资本主义文明的沉重打击。这种打击，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生活方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东西德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同而形成的社会心理上。

二是超越人的国境：在东德，始终存在着统一进程中的、不仅是经济上的、社会上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心理上的社会融合问题（*Eingliederungsproblem*）。对于东德人来说，在一种急剧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精神的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极大转折和社会变革中，许多人生活于一种“西方进口”的没有实现社会融合的陌生社会环境中。不是人进入了陌生的地方，而是彷徨的人的心理，进入了陌生的境地。半个世纪形成的人们习惯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心理，难以在短时间里适应西德的社会，许多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对着二者择其一的尴尬境地：要么无条件的适应这种陌生的社会情形，要么是拒绝这种陌生的社会，而在继续加重的社会疏远环境中（*fortschreitender Entfremdung*）以自己所习惯的方式继续生存。

与这种社会疏远进程相联系，东德在举世瞩目、充满喜悦的德国统一的进程中，缺少社会融合的足够准备。从境外而来的外国人，例如政治避难申请者，依据统一条约被分到新的联邦国家的不同的州中，对于东部的各州而言，大多数人面对政治转换、经济倒退、与西德人的社会地位及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距等原因而产生的自我社会疏远感，增加了对外国人的敌对态度。德国西部也不例外。这导致了在 *Saechsichen Hoyerswerde* 1991 年 9 月的针对外国人的敌对进攻的不法行为。他们发现，在西德像此类的暴力行为（*Gewalttat*），一开始只是很少被注意到，因为在大众媒体上还没有发现此类新的题目。在东德，针对外国人的

日益增加的敌对性，使人们误认为，好攻击和强暴是东德人的特点，而实际上它是由社会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威胁着的社会的边缘性群体的一种过激的自卫反应。这种情况日益增加，随后，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便扩展到整个统一的德国境内。

三、对移民的不信任和防御心态及德国的排外暴力

新的移民状况和德国统一的进程，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在“本土的”和“外国人的”各种不同的人群中，产生了新的紧张关系和恃强凌弱现象：在西部，首先是西部德国人针对东部迁移过来的德国人的不信任和怀疑（**Skepsis**）；在东部相反，东部德国人经常面对着是无所顾忌的西部占领者、更好地生活方式和充满同情心的发展救星（**Entwicklungshelfer**）、严厉地传教士、像踏入半殖民地状况一样的西部德国人，同时，在东德还存在着人种的社会尊重和种族主义的歧视问题（**ethosozialer Achtung und Rassischer Diskriminierung**），如在日常语言中，有一系列针外国人的蔑称，如“**Briketts**”（**Afrikanern**）和“**Fidschis**”，在西部也有“**Ittakern**”、“**Kuemmeltuerken**”、“**Kanaken**”等。

在西部，针对移民的各种不信任在日益增加。首先是关于来自东德和新的联邦洲的迁移（**Zugewandert**）来的移民（**Uebersiedler**）的不信任；其次是对操德语的外迁移民（**Aussiedler**）主要是跨洋的移民（**Uebersiedler**）和操德语的外迁移民（**Aussiedler**），对操外国语言的来自于原先社会主义国家的移民的不信任（**Polskis/Russkis**）；还有跨洋移民，说德语和外国语的外迁移民共同对外国人，首先是针对土耳其人（**keiner Europaeer**）的不信任；最终是在整个德国作为本土的德国人和外来的移民组成了协调一致的防御前线，以对付那些来自于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避难申请者和难民（**Asylbetruenger, Scheinasylanten**）。在各种新的移民不信任情况中，最有特点和怪诞的是：德国人和本土的外国人，同心协力，共同对付新迁移来（**Zugewandert**）的陌生的德国人（主要是来自于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操德语的外迁移民）。

现实情况是，除去第一代的先锋移民以外，德国的土耳其人在通常的情况下能说流利的德语，相反，年轻一代的俄罗斯德国人，他们对新的家乡语言，经常是几乎不理解，或者作为外语，必须重新学习。这就出现一种滑稽的遭遇（**Begegnungen**）。例如：在语言方面，一个本土的土耳其人携带外国护照，可以帮助一个携带德国护照的其他语言的外迁者。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外迁者是陌生的、缺乏社会适应技能的，而本土的外国人拥有社会适应技能、操熟练德语，却由于没有德国国籍而败于外国人法和陌生的德国人。

在没有美好前景的移民状况中，年轻的本土外国人，以这样的态度方式（**Verhaltensweise**）对待其他类型的移民和自身：从人种社会的竞争对手的不安和明显的过分适应（**demonstrativer Ueberanpassung**），到针对政治避难寻求者和其他难民的敌对的武力行为。同时，与敌视外国人的不法行为相联系，本土外国人的怀疑也在不断增长，针对难以驾驭的“非移民国家”的联邦共和国，他们通过感觉到的不公正的生活前景、在政治参与和机构参与中的各种形式的歧视，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与德国的本土人相比，不是作为外国的同国人（**Auslaendischer Mitbuerger**）而是作为国内的非国民（**Nicht-Buerger**）意义上的二等的非德国国民（**Nicht-Deutsche Buerger zweiter Klasse**）。

像移民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种族阶层的形成和社会歧视的种族的合法性（**die ethnische Legitimation sozialer Benachteiligung**），对于社会的认同（**Konsens**）和多种族的并存及多文化的生活方式，是特别危险的。这些危险通过东西德不同的影响而得到了加强：在心理上那些来自于东部迁移者的陌生的德国人，被打上了特别的（种族国家）的印象，他们带着潜在

的防御心态来到了西部，他们发现，自己已陷入一种误以为没有外国人和外国文化影响的德国文化的同质性的无历史观念的妄想中。另外一种影响是普遍对来自东欧的移民人群（Volkewanderung）的忧虑：吉卜塞人（流浪者）恐怖症（Zigeuner-Phobie）。他们误以为，来自罗马尼亚的罗马移民祖先，像以前表现出来的高度现实性的侵略潜势一样，将激起随之而来的移民运动的失调。附加要说明的是：在许多东部社会主义国家（Ostblocks）瓦解的地区，在几十年来的极权主义的恐怖结束以后，依然有残暴的地下活动（或暗流unterstroemung），像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好斗分子，他们自己理解为种族——民族主义（Ethnischer Nationalismus）的解放运动。这些与欧洲东部的社会爆发相联系的冲突和对立（Konfrontation），附着德国自己就存在着的敌视外国人的防御态度和潜在的暴力的局限性和公开的合法性，共同汇成了针对外国人的暴力犯罪行为。

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下半叶最有名的德国新种族主义的恐怖行为，发生在下列地区：1991年9月17日到22日，在东部Hoyerswerda那里，政治避难申请者从他们的住所中被新种族主义分子驱赶出来，在被运走的公共汽车上遭到石块的攻击，而且被击伤。在Rostock-Lichtenhagen，1992年8月23日到27日，政治避难申请者在公众的注视和公开鼓掌下，在他们已被焚烧的住处被围攻和遭到攻击。在西部的“Huenxe”，1991年10月3日，两个难民的孩子被种族主义分子用火烧成重伤。在“Moelln”1992年11月23日和“Solingen”1993年5月29日，很久以来就在德国居住，并在那里出生和成长的土耳其家庭的成员，在他们的房子里被烧死，或受重伤。在1994年3月25日晚上，在Luebeck，1938年民族社会主义的大屠杀以后的德国历史上，再次点燃了犹太人教会的教堂。据德国内务部统计，1992年德国发生2544起仇外暴力事件，1993年又发生1609起，2000年发生了德国统一后历史上创纪录的15651起排外暴力犯罪案件。^{[7] (P249)}

上述针对外国人的暴力行为以及其他城市针对外国人的骚乱，迫使外国人、特别是土耳其出生的年轻的拥有护照的外国人（Pass-Auslaendern Tuerkischer Herkunft），形成了防御和进攻的准备（Angriffsbereitschaft），在整个德国增长着种族社会紧张状态的危险。特别是来自于其出生地国家的跨越国界的政治组织——政党这一冲突的潜在因素（Konfliktpotentiale），如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PKK）在德国的渗透，更增加了德国移民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在土耳其被禁止合法存在的库尔德工人党和在德国的无数库尔德（Kurdistan）组织遥相呼应。这诱发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德国存在广泛移民但又不承认移民国家的背景下，在法律上确定一个外来移民组织的政治和种族文化方面的义务（Ergagement）的法律分界线是非常困难的。在德国的土耳其库尔德人，要求庆祝他们库尔德新年活动，这涉及到德国主流文化与移民群体非主流文化的保留及德国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此后的1994年3月流血的库尔德人游行示威后，这一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另外，在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的合法政治地位问题，历来得到欧盟成员国在道义上的支持。处于对西欧民主政治的理解，在西欧许多国家看来，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有其合法的存在理由，土耳其政府不容许其合法存在，恰恰说明：在土耳其国内存在着对库尔德人的种族压迫，也说明土耳其政府尚缺乏像西欧国家一样的民主体制。正因为如此，欧洲联盟在东扩问题上，将土耳其排在东扩候选国的最后。这也使得库尔德工人党和在德国的库尔德（Kurdistan）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似乎有其合法的依据。但是，在德国社会整合的层面上，上述移民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显然也是德国社会移民群体动荡不安的因素之一。

德国社会针对外国移民的暴力行为，引起了世界各新闻媒体和许多国家的关注，这自然使人们回忆起了以种族灭绝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因此，各新闻媒体和学术界对统一后德国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行为，不是用“法西斯主义的”，就是用“德国的”来称呼。实际上针对外国人的恐怖行为在其他的欧洲移民国家中也同样存在，而且在欧洲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伴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

作为宗主国——欧洲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葡萄牙等国家，从其殖民地国家中接受了大量的外来移民，英国的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印度、巴基斯坦、肯尼亚和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主要接受了其北非的殖民地的移民，而荷兰殖民地移民主要来自于印度尼西亚，在葡萄牙则主要是来自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移民。尽管上述欧洲的殖民地宗主国，在外来移民加入国籍、赋予同等的国民权利和义务、社会一体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但是，移民在就业、社会福利、平等等方面所遭受到的歧视现象依然大量存在。另外，移民在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与本土的国民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争夺和冲突，导致部分政治家和社会大众惊呼：我们的“社会福利之船已经满了”。因此，在国家政治和社会大众两个层面上，出现了反对外来移民的强烈呼声。在国家政治的层面上，以反对外来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在欧洲上述国家的议会大选中，得到了部分选民的有力支持，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反对外来移民的右翼政党——法国的“民族阵线”主席勒庞在法国总统大选中击败了诺斯潘，奥地利右翼政党——以海德尔为主席的自由党在议会大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富图恩为主席的荷兰右翼政党在荷兰议会大选中取得胜利等等，尽管由于其他因素，最终使上述政党主席未能进入政府，但是，以反对外来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得到了部分社会大众层面上的支持，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右翼政党的发展，对西欧传统和现行的民主政治体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在社会大众的层面上，一些反对移民的极右翼分子，无视法律和民主，对外来移民实施了犯罪的暴力行为。20世纪60年代英国白人下层的忧虑中产生的“光头运动”（Skim-Bewegung）、德国的“青年秃头”（Die jugendlichen deutschen Glatzen）、法国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都对政治避难申请者和其他外国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践踏和打击。即使在视为成功的瑞典也是如此，正如 Tonmas Lundin 所说，“在被称为移民政策成功典范的瑞典，排外和极右翼主义也在迅速蔓延，焚烧难民营，欺负外国人，散布种族主义，新纳粹动用暴力的顽固核心向所有‘非雅利安人’宣战。评论家们把事态的发展归咎于一度被人盛赞，而现在却失败的瑞典移民政策，归咎于经济态势。”^[8]

在统一的德国，新的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行为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针对外国人、特别是犹太人的残杀和迫害，以及大众媒体关于法律上的过激主义和排外的武力行为的轰动报道，使人们获得了德国移民社会不完整的画面。实际上，在统一的德国，也同样存在着大多数的德国人和少数外来移民共同生活的正常状态。这包括德国人出于乐于助人的善良天性和人道主义的义务，所给予外来移民的大量的无法估计的组织起来的和自发的友好帮助：从接纳和照料难民，到帮助联系和看管他们的住处，甚至在驱逐移民的威胁面前出身保护他们，而将遭拒绝的政治避难申请者非法的藏匿起来，使他们免于被政府驱逐出境的悲惨命运等等。

四、无移民政策的移民国家与德国新移民政策的拟定

在关于德国对外国移民的恐惧和排斥的众多解释中，多是涉及到移民、一体化、少数民族以及他们的社会政治形态问题，Klaus J. Bade 教授认为，这只是涉及了核心问题（Die Kernproblem）的边缘。与移民、一体化和少数民族问题相比，寻找社会大众中的持续的迷失政治方向的排外态度和对外国人恐惧的社会和政策等深层次的原因，更具有根本和重要的价值。在社会和政策的层面上，一个明显的社会事实（Tatsachen）是：德国最近十多年以来，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新类型的移民国家——不是从法律的意义，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然而，这一社会事实却处于在政治上被否认和拒绝的境地。

德国政府历来否认德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德国不是移民国家”，国民议会和几乎所有政府机关的动议都这样认为。与此相联系，在社会政策上合乎逻辑的存在着的是外国人政策，而不是移民政策。1983年，围绕着“德国是否是一个移民国家”，进行了一场过去是、现在

依然是无聊的争吵。这里值得推荐和关注的是政府方面的解释或更正 (Dementi)，认为历史上跨洋的典型的移民国家，经常是对原居住人进行排挤和消灭以后，才定居在大片的土地上，建立城市，发展经济结构，并通过移民的进程，形成了社会和国家。因此，这样典型的 (Klassisch) 移民国家，德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可能是。

由于政府否认德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存在，因此，到 20 世纪 90 年代，伴随着德国的统一，德国依然在“德国不是移民国家”的理念中，延长着自欺欺人的捉迷藏的游戏 (versteckspiel)。在政治和政府的“上层”层面上，总是否认新型移民国家形式的存在，而在社会和社会大众的“下层”层面上，日常经历的是日益增加和强化的外来移民的跨文化或多文化的现实——“不是移民国家”的自相矛盾的 (paradoxe) 的移民状况 (Einwanderungssituation)。由于在政治和政府的层面上否认德国作为非典型的新型移民国家的存在，因此，在法律和社会政策的层面上，对于外来移民的大量增加和移民社会问题的解决，缺乏应有的组织结构上和政策上的有计划地准备。日益成长的移民问题的压力又反过来转向于社会的两个层面：在社会大众的“下层”层面，面对着政治避难者、战争难民和其他非法移民的歇斯底里 (Hysterie)、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以及社会福利、就业岗位相对减少的社会现实，在社会大众的心理层面上，充满了对日益增多的外国人的担忧和恐惧，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的下层、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改善的原东德人来说，外国移民无疑成为其社会竞争的有力对手。在政党、政府和社会的“上层”层面，各政党在移民问题上争论不休，并以移民问题为手段攻击其他政党，特别是执政党，致使政府在移民问题上迟疑不决，一方面面对着日益增多的外国移民，在事实上德国已经成为非典型意义上的新型移民国家，但另一方面，一向以日耳曼民族为自豪的德国政府又不愿意承认这一现实。即使出于政党政治和议会选举的考虑，某些政党甚至政府也违背自己的初衷，而拒绝承认移民国家的现实，这在政治上就存在着一种合法性的危机。尽管在 1990 年德国统一之前，这一情况就已经存在，但在德国统一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面对移民问题，来自社会下层的一筹莫展 (Ratlosigkeit) 和来自社会上层的政治上的合法危机的相遇 (Zusammentreffen)，将从根本上动摇西方所崇尚的民主体系。这一严重后果尽管早被学者和有远见的政治家们警告过，但是在现实上却是徒劳的。结果到 1992 年，威胁到议会民主体系的危机 (eine Krise des Parlamentarisch-demokratische System) 出现了。这让德国统一的功臣——联邦总理科尔在 1992 年秋天说出“国家处于紧急状态” (Staatsnotstand) 的言论。

Klaus J. Bade 和 Mainer Muentz 教授认为，“在 1991 年统一进程中和对以后的对外国人的忧虑，充满暴力的种族主义和排外暴力，不是作为不可避免的移民和社会融合的结果，而是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相应机构和政策的可以避免的后果。它是在移民问题上和移民政治中缺少相应移民方案、计划和政策的一个攻击性的回答。这在 60 名研究移民的科学家撰写的 1993 年出版的《德国移民宣言》中已经指出了。”^{[9](P221)}

1993 以后，在移民问题上，无论在社会大众的层面，还是在政府和政党的层面，人们在观念上逐渐经历着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人们由对移民危险日益增长的恐惧和高度的警戒主义 (Alarmismus)，逐步转向于慢慢习惯和漠不关心的冷漠中。在 1994 年的大选中，出于新增长的排外的武力原因，由政党和各媒体漫不经心点燃的对政治避难的歇斯底里 (Hysterie)，在很短的时间内，选民的兴奋点从如下多个方面：移民、一体化和少数民族问题等高度爆炸性的题目领域，迅速减退了。于是，具有轰动效应的排外武力和暴力行为下降了。最近几年来，过去产生普遍“地震效应”的针对少数民族的排外武力行为，只是在媒体报道中附带地被提及，像社会事故统计学形式一样。警察发言人和其分管的地方代表也致力于：否认针对外国人的敌对背景 (Ausländer feindlicher Hintergrund) 或者特别声明，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行为是没有依据可查的。从紧急告警和歇斯底里的位置，到达政治上的漠

不关心和社会上的不敏感，这是社会心理学上（**Sozialpsychologisch**）的“异常警报”。显然，没有疾病判断力的病人，像人们知道的一样，是没有治疗能力的，国家也是如此。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移民和一体化政策问题上，德国政府拒绝承认事实上的新型移民国家，从而在机构和政策的层面上缺乏对移民问题的结构性和工具性安排，而现实社会中的大量移民存在和针对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行为，政府力图淡化其存在，这样，在“政治性的捉迷藏游戏”中，德国政府不仅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而且使得移民社会问题日益严重，而成为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

之所以说现在的移民问题已经成为德国社会问题的核心问题，就是因为过去的移民问题只是德国社会问题的边缘化问题，因此，它没有对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全面影响。而现在德国移民问题则不同了，在政党政治和民主选举的层面上，大量选民对移民的拒绝态度和对外国移民大量增加的恐惧，使得以反对外国移民为特征的右翼政党迅速崛起；在经济的层面上，在德国 470 万失业人口中，有近 300 万是外国移民，面对国际间的移民浪潮，人们产生了一种危及自身安全的感觉。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福利国家因为移民和迁移现象的大量存在而产生的强烈危机。人们深刻地感觉到：“福利国家的福利之船已经满了，福利国家的人们再也不能负担起更多的移民。”^{[10] (P441-442)} 沉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负担，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研究移民文化的专家 **Hechmann** 教授认为，民族概念，应理解为一个民族的一致性和团结性(**Gemeinsamkeit Solidarität**)，自我表现意识的统一性，首先是在一个国家机构中有共同生活的愿望、有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政治观（共同的信念）和学术见解。而不是说生活在一起，就是同一民族。而大量移民群体的存在和缺乏一体化的移民政策，使得外国移民较好地保持了自己所独有的民族文化。这就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出现了德意志“主流文化”和其他民族“非主流文化”同时并存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了“主流文化同化非主流文化”和“保持多元文化”之争。^{[11] (P321-322)}

今天，在以德意志民族为核心的德国 8200 万人口中，有 8.9% 即 740 万人是外国人。大量移民的存在与德国政府缺乏移民的社会融合和社会一体化的准备，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但是，必须承认的是，外来移民及其所拥有的民族文化、特殊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结构，与德意志民族共处于一个“伙伴社会”（**Partnergesellschaft**）中，这种状况是不能通过政府的否认、拒绝和排斥外来移民来实现移民的一体化进程和与德国社会的真正融合。要对影响整个德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的移民问题，予以彻底的解决，就必须从德国发展的未来、德意志民族的长远利益、外来移民的根本利益的关注等多角度，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对已不适应于移民新形势、新情况的、作为限制的社会政策看待的旧的社会政策，进行根本性的修正，并出台一项在政治层面和社会政策层面是“积极的”、“灵活的”作为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

作为一体化的解决移民问题的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应基于如下几个原则：

第一、新移民政策必须作为社会政策的重要部分，必须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政府、政党和社会大众所关注，并以广泛的和一体化的计划来推进这项政策。因为移民政策和与之相联系的移民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是社会问题的边缘性问题（**Randproblem**），而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核心任务（**sondern zentrale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Aufgaben**）。这是由如下三个因素所决定的：

首先，亟待解决的是德国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引进的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的客籍工人和劳工，以及他们的后代的国籍问题；

其次，面临着日益下降的出生人口，如果没有作为社会政策的家庭政策的较大改革，劳动力人口的大幅下降，将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德国现有人口 8200 万，其中外籍人口 740 万，占总人口 8.9%。自 70 年代以来，德国出生率一直保持低下，1999 年的出生率不到 1%，人口数量多年来持续呈负增长状态。据德国联邦统计局预测，假设没有外国移民，到 2050 年，德国人口总数将减少至 5900 万。如果要在 2050 年仍保持现有人口规模，那么需要每年“引进”30 万至 40 万外国移民，到那时，外国人所占比例将达到 28%。除此之外，德国社会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如果没有外来移民，2050 年德国就业人口将由目前的 4100 万减少为 2600 万，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届时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将翻一番，这无疑将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德国必须走移民国家的道路；

最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欧洲与当代美国在科技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全球科技中心在二战以后从欧洲到美国的转移，迫使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必须借鉴美国成功的移民经验，制定和实施积极的、开放的移民新政策，以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人才到德国工作。德国劳动力市场多年来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紧缺的问题。虽然德国是欧洲失业率较高的国家，2001 年的失业率将近 9%，但是在某些高科技行业，特别是在与新经济相关的电子科技、IT 等行业，人才却十分匮乏。据分析，德国 IT 业至少缺少 5 万至 10 万名专业技术人员。造成这一情况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德国的高税收制度令就业市场吸引力不足，造成大量本国人才外流；另外，德国高等教育体制过于僵死，例如没有学士学位，学制相对较长，德国年轻人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28%）也远远落后于美国（44%）等西方国家，因而形成较大人才缺口。于是引进外来人才成为德国经济的迫切需要，直接关系到德国未来的经济发展。^[12]可以预见，这个任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紧迫。

第二，作为社会政策的移民政策，只有在其得到一个广泛性的、根本性的社会同意的支撑下，才能付诸实施并富有成效（*fundamentalkonsens*）。显然，针对外国移民的社会政策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在一种非常自由的民主体系中（*in einer freiheitlichen Demokratie*）进行的，而目前，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其他欧洲非典型形式的移民国家，无论是在政府当中、还是在社会大众的层面，仍有不少社会大众对外来移民的到来存在较大的恐惧和不安，因此，在社会行为上，依然对移民有不同程度的拒斥和敌对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争取从政府到社会层面的广泛的支持，就成为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移民政策的一体化的计划和长远的可预见的远景，而让这些人看到自己个人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不仅得到保证，而且得到增加，从而消除这部分人对移民的恐惧和不安。显然，在政府和社会大众两个层面上，需要大范围的社会动员，以求得对移民文化上的宽容和和平共处。只有这样，制定一体化的新移民政策才有可能。

第三，新移民政策需要一个欧洲视角下的协调一致的关于针对欧洲外部迁移的压力（*wanderungsdruck*）的整体计划——这一计划不仅作为“欧洲的防线”（*Festung Europas*）来抵御那些不期望的移民和非法移民，而且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清晰的和尽可能透明和人道的详细的到德国和欧洲国家的移民法规（*verkehrsregeln*）。因为德国是“申根协定”国，依据该协定，获得“申根协定”成员国一个国家的签证，就等于获得了前往其他成员国的签证。^[13]因此，德国的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申根协定”的视角，而且需要具有欧盟层面上的视角。特别是欧盟东扩以后，德国将面对原东欧国家移民潮的冲击。

实际上，德国政府清楚地意识到：新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移民社会问题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灵丹妙药，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因为全球化大大推进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同国家间的跨越国境线的移民现象（*Wanderungsgeschehen*）。但正如 Klaus J Bade 教授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理解和面对日益严峻的移民社会问题，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简单地否认德国是一个事实上的移民国家而束之高阁，我们依然有责任和义务，去面对和逐步

解决移民社会问题，而不是将这些问题留给下一代，留给未来。^{[14] (P61)}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政府于 2001 年开始着手拟定，到 2002 年正式批准新移民法。德国新移民法有那些具体的创新内容？它对德国移民问题的解决将发挥什么作用？它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将在以后的论文中详细论述。

参考文献:

- [1] Klaus J. Bade. Die Multikulturelle Herausforderung: Menschen ueber Grenzen-Grenzen ueber Menschen [M]. Muenchen: Beck 1996.
- [2] Klaus J. Bade. Drehscheibe Deutschland: Wanderunge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J]. Deutschland Frankfurt: Frankfurter Societaets-Druckrei GmbH. 2000. 12.
- [3] Dietz Barbara, Hilks Peter. Integriert oder Isoliert? Zur Situation Russlanddeutscher Aussiedler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 Muenchen: Beck, 1994.
- [4] Klaus J. Bade. Deutsche in Ausland-Fremde in Deutschland: Migration in Geschichte und Gegenwart [M]. Muenchen: Beck 1992.
- [5] Heckmann, Friedrich. Ethnische Minderheiten, Volk und Nation. Soziologie inter-Ethnischer Beziehungen [M]. Stuttgart: 1992.
- [6] Weidendeld Werner. Das Europaeische Einwanderungskonzept [M]. Guentersloh (Bertelsmann Stiftung): 1994.
- [7] 姚宝、过文英. 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8] Tonmas Lundin. Migration und Entwicklung [J]. Deutschland Frankfurt: Frankfurter Societaets-Druckrei GmbH. 2000. 12.
- [9] Klaus J. Bade/Mainer Muentz. Das Manifest der 60: Deutschland und die Einwanderung [M]. Muenchen: Verlage G.H. Beck 1993.
- [10] Weiner/Myron. Studies on Internaional Mi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M]. Vienna: 1995.
- [11] Heckmann Fridrich. Ethnische Minderheiten, Volk und Nation. Soziologie inter-ethnischer Beziehungen [M]. Stuttgart: Enke Verlag, 1992
- [12] 德国为何转向移民国家 [N]. 北京: 中国青年报, 2001-07-21
- [13] 宋全成 移民政策中的国家主权及其让渡 [J]. 北京: 欧洲 2000-10-10
- [14] Klaus J. Bade. Integration und Illegalitaet in Deutschland [M]. Osnabruock: IMIS, 2002.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Issues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Germany

SONG Quan-cheng

(Th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at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250100)

Abstract: Looking back to the history of modern immigration development in Germany, the phenomenon of immigration has existed all the time and experienced with the radical changes from the migration country to the immigration country. From the World War II ended in 1945 to the unity of Germany in 1990, there was about 15 million foreigners immigrated to Germany, and Germany has become a virtual non-typical immigration country gradually. However, the immigrants in Germany are not integrated into the society and have become a minority colony at the brim of Germany. Disbelief and defence psychology has existed widely in the immigrants, and the violence and antialien actions on the immigrants have been increased upward. The reason behind is that the two classes, Germany political party & government and the masses, are reluctant to admit Germany existing as a virtual non-typical immigration country. Therefore, there is a law of foreigners only and no law of immigration in Germany in terms of policy and law. In order to completely resolve the immigration issues and reach the target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Germany,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a systematic, complete, effective, active, and new immigration policy.

Key words: Germany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Country; Immigration Policy

收稿日期: 2003-11-06

基金项目: 德国学术交流中心 (DAAD) 研究项目和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长基金研究项目: “欧洲移民问题与欧洲一体化”

作者简介: 宋全成, 山东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博士。奥地利格拉茨大学移民历史研究所高访学者、德国奥斯纳布鲁克大学移民与跨文化研究所访问教授。主要研究欧洲政治学、欧洲移民问题。电子邮箱: quancheng.song@sdu.edu.cn